

# 绪 论

## 一、本书的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

日本是中国一衣带水的邻邦。早在中国的古代史书《三国志》的《魏志·倭人传》中，就已有了对日本较详细的记载。而且，这个记载比日本的第一部正史《日本书纪》还早了大约 400 年。以后在中国的官修正史中，虽大都列有日本传，但古代中国对日本认识的发展却很迟缓。鸦片战争后，在边关危机的形势下，一些开始睁眼看世界的知识分子对日本的存在虽较以前有所注意，但直到近代初期，中国对日本的认识仍然是模糊而肤浅的，缺乏较为深入的了解。总的来看，在古代中国人的心目中，日本不过是一个受过中国文化熏陶的东隅小国，尚不足为虑。

1868 年，日本实行明治维新后，迅速走上了近代化的发展道路，逐渐成为资本主义强国。而同时代的中国则国势衰微，忧患不断。1874 年，日本悍然侵略中国台湾；1875 年又发动战争进攻朝鲜。日本的崛起开始引起了中国的关注，而 1894—1895 年的甲午之战，小国日本竟然打败了自视为老大帝国的清朝，令中国对其刮目相看。这时的日本，已经成为中国不可忽视的国家。面对中国的衰落与日本的崛起，中国的有识之士痛感应积极学习西洋文

化以求存图强。他们认为“取法泰西 获效最著者莫如日本”<sup>①</sup>；赴日学习，不仅路近费省，而且文字相通，易于通晓。对中国来说，日本不仅是学习西洋文化的成功典型，更是一条输入西洋文化的捷径所在。由是 甲午战后，中国人或留学 或游历、考察 负笈东渡者不绝于途，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东游热潮。而且，在这股东游热消退以后，直到民国初年，赴日的中国人仍未间断。直隶作为北方地区较大的行政区域，其东游者的人数相对较多，较具代表性。本书将以直隶省为中心，对清末民初中国人的日本观进行研究。

选择直隶省作为问题的立足点，乃是出于下述考虑。

1. 在清末东游热的形成过程中，直隶省政府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1901—1907 年袁世凯督直期间，直隶省开展了有组织、有计划的东游活动。如 1905 年，直隶先后组织 4 批士绅赴日，进行以学务为主的考察。1907—1908 年，直隶又先后派遣 3 批士绅赴日考察地方自治。袁世凯甚至还规定，各州县实缺人员，除已到任者外，一律先赴日本游历 3 个月 参观行政、司法各署及学校、实业大概情形，并责令他们期满回国后呈验日记，以征心得。在袁世凯的组织和要求下，直隶省官民纷纷东渡。民初，直隶省的东游者人数虽大为减少，但仍不断有人前往。与清末相比，民初直隶省的东游者多为教育界人士，其对日本的参观、考察也以教育为主。清末民初，直隶省官民络绎不绝的东渡，使其成为东游者人数较多的省份之一。因此，从东游者多寡的角度出发，笔者认为直隶省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2. 清末，在袁世凯的主持下，直隶的各项事业均走在全国的前列，成为首善之区。清政府在推行新政的过程中，往往也以直隶

为改良的试点，成功后才推及全国。其地方自治的开展即是如此，而谕令全国设立的劝学所亦是首先发端于直隶。及至民国初年，直隶的教育事业在全国仍居领先地位。这些成绩的取得，与直隶省官民的大量东游有何内在联系？反过来说，东游对直隶省的发展又起了怎样的促进与推动作用？笔者意欲通过本书的研究，来对此问题进行论释。

3. 选择直隶省还出于利用资料的考虑。清末民初，直隶省的东游官民在从各个方面对日本进行学习、考察的同时，还留下了不少东瀛游学的笔记、日记及考察报告。以下为方便叙述，姑且将这些东游笔记、日记及考察报告统称为“东游日记”。由于这些“东游日记”记录的是游日者学习、考察中的所见所闻及心得体会，且多为作者所亲历因而内容较为真实、具体。而且本文所用的一些“东游日记”确属鲜为人知如罗毓祥的《东游日记》（排印本）王锦文的《乙巳东游日记》（稿本）等。从掌握第一手资料的角度看，这些“东游日记”对研究当时中国人的日本观，无疑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

另外还必须说明，本书所言之清末民初的时间范围为 1895—1928 年。将 1895 年作为时间范围的上限，是因为甲午战争在这年结束。甲午之役，清廷受到了沉重的打击。为挽救日见衰败的颓势，清政府决定师仿日本，走富强之路。此后，在清廷的提倡、鼓励与日本方面的积极劝诱下，国人开始陆续东渡，并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东渡热潮。而选择 1928 年为时间范围的下限，则是由于直隶省在 1927 年 7 月被更名为河北省。翌年，北洋政府倒台。北洋政府的主体是袁世凯所建立的封建军事集团——北洋军阀。1912 年，袁世凯篡夺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当上了中华民国大总统。袁上台之后，即利用其军事力量，控制了中央与地方政权。1916 年袁死后，北洋军阀虽分化成皖、直、奉三大派系，但北方地区仍由其控制。并且，为争夺地盘与权利，这三大军阀派系不

断混战，给社会和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在南方国民革命军的多次北伐下，1927年直系军阀被消灭，1928年，统治中国17年的北洋政府彻底垮台，北洋军阀亦随之覆灭。此后，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开始了对中国的统治。从清末到民初，直隶的历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不仅是名称的更改，在行政区划与行政权力上，河北省与原直隶省均有很大的不同。换言之，直隶省作为一行政单位，在1928年之前是存在的，而自1928年起，就永远地从历史上消失了。

本书将以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以直隶省为中心，对清末民初中国人的日本观进行梳理、分析，并对东游的作用及近代中日文化交流中所表现的一些特征与问题加以论述。由于游日者的见识与学力各不相同，所以，他们观察事物的角度及得出的结论也就各异。如果不从实证的角度出发，就很难对他们的日本观进行较为全面的了解。因此，本书主要运用实证的研究方法，对清末民初中国人的日本观进行具体的、细致的探讨，进而掌握他们对日认识的全貌。同时，由于游日者对日本的学习、考察涉及到教育、司法、行政、实业等诸多领域，所以，本书也采用了历史学、教育学、法学、行政学等多学科结合的研究方法，以期对游日者的对日认识进行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与个别思想先行者的日本观相比，普通官民的对日认识或许不那么深刻。但从全面分析、把握近代中国人的日本观的角度出发，研究普通官民的对日认识又是非常必要的。本书所研究的认识主体以清末民初的直隶省的官民为主。直隶地处中国的北方，是一个较大的行政区域。按照社会学对社会的划分，直隶乃一地域社会。其官民作为这一地域社会中的主要社会阶层，在当时曾有其独特的地位；为促进该地区的社会发展，他们也曾发挥过独自的作用。以某一地域中的某些社会阶层作为认识的主体，并对其认识的历史进行研究，显然也在社会史的研究范畴之内。故此，本书也纳入了一些社会史的研究

究方法，以廓清直隶所走过的近代化道路；并希望通过这一研究，能够对正确地把握近代中国社会的发展、变化有所帮助。另外，在论述的过程中，有时也需将日本的发展状况与中国当时的实际情况相对照，以便对国人的对日认识进行更加清晰的把握。因而，本书也适当地使用了比较研究的方法。

## 二、国内外研究动态

关于中国人的日本观的研究，并不鲜见。日本对此问题着手较早，因而留下的成果相对也较多。日本人橘朴的《孙文的东洋文化观及日本观——大革命家的最后努力》（《中国研究》1—4. 1925年）岩村三千夫的《孙文的日本观》（《现代中国和孙文思想》，1967年）久保田文次的《孙文的日本观》（辛亥革命研究会编《中国近代史论集》汲古书院，1985年）、藤井升三的《孙文与日本——以孙中山的对日认识为中心》（《亚洲文化》15. 1990年）及有高岩的《清末中国人的日本观——特别是〈日本国志〉的研究》（《历史公论》78. 1938年）麓保孝的《清末黄公度所见之日本》（《历史教育》8—1. 1960年）、泽野六郎的《谭嗣同的日本观》（《历史教育》8—1. 1960年）森永优子的《近代中国的对日观——关于戴季陶主义的考察》（《史观》93. 1976年）等文，先后以个案研究的方式，对孙中山、黄遵宪等人的日本观进行了分析。实藤惠秀在潜心于中国留学生问题研究的同时，亦留心考察中国人的对日认识，曾发表《留东外史及其日本观》（《中国文化月报》12. 1936年）《中国人的日本观》（“中国文化丛书”10《日本文化与中国》大修馆书店，1968年）等书和文章，介绍了中国人对日本男性与女性的评价以及中国人对日本社会的认识。

以历史的发展为主线，较为系统地研究中国人的日本观的论著有石原道博自1951—1955年连续发表了《中国的日本观的初始形态——隋以前的日本观》（《茨城大学文理学科纪要》人文科学

1号,1951年3月)、《中国的睦邻友好的日本观的展开——唐、五代、宋朝的日本观》(同上,人文科学2号,1952年3月)《中国的嫌畏的日本观的形成——元代的日本观》(同上,人文科学3号,1953年8月)及《日明交涉的开始和不征之国日本的成立——明代的日本观(一)》(同上,人文科学4号,1954年3月)与《围绕日明贸易的日本观——明代的日本观(二)》(同上,人文科学5号,1955年3月)等文章,对清以前中国不同朝代的日本观进行了具体的论述。山口一郎的《近代中国的对日观》(亚洲经济研究所,1969年)一书收录了自1912年至该书写作时,中国出版的有关日本的部分文献,并对其进行了解说。尔后,他又借助上述文献,对中国人的日本观进行研究,出版了《近代中国对日观的研究》(亚洲经济研究所,1970年)一书。作者以1945年抗战胜利为界限,将近代中国人的日本观划分为战前与战后两个时期,其战前期的上限为1912年民国成立。在战前期的序章中,作者首先将民国以前中国人的日本观分为4个时期〔1. 自古代至宋末,2. 自元代至清末(明治维新)3. 自明治维新至甲午战争,4. 自甲午战争至民国〕,从研究史回顾的角度进行了简要的介绍。作者认为,甲午战争之后,中国人对日认识的转变表现在:清朝内部,以梁启超为首的改良派,对明治维新后的日本,特别是其所实行的新政,评价很高;在保守派当中,也出现了通过日本以学西方的主张。日俄战争之后,虽然也有人对日本的扩张野心产生了警惕,但总的来看,中国人对日本还是充满了好意与期待。并且,这种亲日的感情直到民国时期仍然存在。对民国至抗战胜利这一时期的中国人的日本观作者从官僚层·文人、国民党、共产党三方面,分别进行了论述。关于官僚层·文人的日本观,作者认为,在中国近代史上发挥了重要作用的改良派官僚的对日认识构成了当时官僚层对日观的主流,而蒋百里的日本观则视为官僚层与文人的总代表。此外,伊东昭雄等人合著的《中国人的日本观百年史》(自由国民社,1974

年)一书,通过资料翻译及对其历史背景的解说,介绍了鸦片战争至1972年的100多年间,中国人对日本及日本人的看法与认识。作为参考资料,作者还选取了陈其元、黄遵宪、宋教仁、戴季陶、李大钊、郁达夫等人所写的论述日本的30余篇文章,分别附在了相关章节的后面。

美国人 Allen S. Whiting 撰写的《China Eyes Japan》(1989 by The Regents of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在日本以《中国人的日本观》为名翻译出版(冈部达味译,岩波书店,1993年)。该书利用中国出版的有关书籍、杂志、报纸、小册子及连环画等资料,结合其在1986年七八月间对中国一些官员、学者、记者及从事对日经济交流工作的人们的采访,从战争认识、1985年发生的学生反日游行、经济合作关系等视角,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中国人的日本观及其成因进行了论述。最后,作者还从政治与经济两个方面,探讨了80年代(1982—1987年间)中日间所存在的问题及90年代的中日关系。

以国内而言,较早出版的有王朝佑的《我之日本观》(京城印书所,1927年)、戴季陶的《日本论》(上海民智书局,1928年)、蒋百里的《日本人——一个外国人的研究》(大公报,1939年)。此外,周作人、丰子恺等人亦发表了许多有关日本人及日本文化的文章。这些著述,从社会、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等不同的角度,以作者置身其中的切身体会为重要依据,对日本进行了较为客观的论述,俱被视为中国的日本研究的名篇。1943年,日本人鱼返善雄编注了《中国人的日本观》(中国文化集刊之二)(东京目黑书店,1943年)一书。该书由12篇中国人谈日本文化的文章组成,以中文排印,主要是想为学习中文的日本人提供原文的阅读材料。因而,是书虽由日本人编辑,并在日本出版,但仍应视为国内作品。与此类似,尚有玉岛信义编译的《中国的眼睛——从鲁迅到周恩来的日本观》(弘文堂,1959年)。

1974年,王玺发表《黄遵宪对日本的认识》(《大陆杂志》49—1)一文。该文应是国内较早以个案考察的形式,对中国人的日本观进行探究的一篇作品。此后则有钟叔河主编、王晓秋校注的《甲午以前的日本观——早期日本游记五种》(岳麓出版社,1985年);武安隆、熊达云合著的《中国人的日本研究史》(该书最后一章为《中国人著作中所见之日本人观》,日本六兴出版社,1989年);刘学照、方大伦的《清末民初中国人对日观的演变》(《近代史研究》1989年第6期);王晓秋的《近代中国人的日本观的变迁》(《日本学》1991年第3期)李庆的《论黄遵宪的日本观——以〈日本杂事诗〉为中心》(《复旦学报》〈社科版〉1994年第4期)等。这些著作和文章利用何如璋、黄遵宪、王韬、李筱圃、傅云龙、康有为、李大钊等人的东游遗墨或有关论述,为我们廓清了近代中国人日本观的脉络。他们普遍认为,近代中国人的对日认识大致经历了如下几个阶段:从不甚了了到睁眼相看,从走马观花到细致调查,从全盘肯定到有所批判。

近年来,国内有关中国人的日本观的文章并不多见。其中,周启乾的《晚清知识分子日本观的考察》(《日本学刊》1997年第6期)一文对自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初晚清知识分子的日本观分3个部分进行了探讨。在第2部分中,作者从工业和商业、金融机构、各类教育、市井生活与风俗习惯4个方面具体、系统地论述了他们对明治维新后日本之发展的认识与评价。

对近代中国人的东游热及其对日考察进行研究的著作有熊达云的《近代中国官民的日本考察》(成文堂,1998年)。在该书中,作者首先对中国官民的对日考察从开始出现、考察热的形成、考察者的派出经过及考察的具体展开等方面,进行了历史的考察。然后,论述了考察日本的中国官民作为近代日本的宣传者、新制度试行的实践者、立宪事业的提倡者与设计者,在清末中国近代化发展的过程中所带来的影响与所起的作用。作者运用中日两国的大量

史料，以实证的方法，对明治维新后中国人的对日考察进行了系统、深入的研究，颇具开创性。不过，该书对中国近代游日者的对日认识，涉及不多。有关近代中国人的对日考察的研究论文有实藤惠秀的《吴汝纶的日本考察》（该文载于实藤惠秀著：《近代日中交涉史话》春秋社，1973年）容应英的《吴汝纶与〈东游丛录〉——一个“洋务派”的教育改革草案》（该文载于平野健一郎编：《近代日本和亚洲——文化的交流与摩擦》，东京大学出版会，1984年）贺跃夫的《清末士大夫留学日本热透视——论法政大学中国留学生速成科》（《近代史研究》，1993年第1期）汪婉的《直隶省的教育改革与官绅的日本游历》（《史学杂志》，1997年3月第106编第3号）与《新政时期中国官绅的“日本学事考察”与日本方面的对应》（《中国——社会与文化》，1997年6月第12号）（据悉汪婉已出版了《清末中国对日教育考察的研究》（汲古书院，1998年）一书，惜笔者尚未获见）等。汪婉在上述两篇文章中，详细探讨了清末中央及地方官绅对日本教育考察的展开与日本方面的对应措施。并利用县志等有关资料，将清末赴日的直隶省官绅分为从事省教育行政的官员、州牧、乡绅三个层次，对他们的教育考察进行了论述。但对这些游日者的在日观感及其回国后所发挥的作用，作者涉及较少。

上面这些论著，从各个不同的角度，为我们了解近代中国人东游热的形成及其对日考察的全貌提供了线索与参考。

国内外对中国人的日本观与对日考察，特别是近代中国人的对日认识的研究尽管已有了如上不少的成果，但从所涉及的范围来看，迄今为止的研究多注重某个人物的日本观或近代中国人的日本观的总体之变迁的考察，对游日者考察具体领域所获得的具体认识，还缺乏更加系统的归纳和总结。从研究的角度及所利用的资料来看，以往的研究大都以全国为着眼点，或只对一些广为人知的人物的日本观进行考察。在某一地区范围内，以普通官民阶

层为对象来进行研究的则很少见；而以直隶省官民的“东游日记”为主要史料依据，从各个不同的领域，分门别类地对其日本观及其回国后所发挥的作用予以有力研究的仍尚未获见。基于上述看法，笔者选择本课题进行研究。

### 三、研究清末民初中国人的日本观的意义

在 21 世纪即将到来之际，以直隶省为中心，对清末民初中国人的日本观进行研究，具有如下意义。

1. 有助于加深对日本近代化历史的了解。由于日本的近代化是一个复杂的历史过程，因而有必要对其进行细致入微的研究。迄今为止，有关日本近代化的研究多依据日本方面的史料，而本文则主要依据中国人亲历的记录进行研究。从认识的准确性来看，中国人所著的“东游日记”或许不若日本史料，但他们从中国人的独特视角所进行的观察，或许可以为我们提供有异于依据日本方面的史料所获结论的新鲜见解。并且从教育、实业、司法、行政等各个领域对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日本近代化的发展过程进行考察，可以使我们对成功的经验与失败的教训获得更加切实、具体的认识，这对了解日本近代化发展过程的全貌也是必不可少的。笔者愿以此为我国的日本近代化研究作出些微的贡献。

2. 为中日近代史的研究补充新史料。进行历史研究，史料是非常重要的。而发掘并利用新史料，为治史者历来所重视。本文所使用的资料当中，既有鲜为人知的稿本，也有很少为他人所利用的出版物。如王锦文的《乙巳东游日记》与刘潜的《东游旅人琐记》<sup>①</sup>皆为稿本，首次为笔者所使用。王桐龄的《日本视察记》（原

刘潜所著《东游旅人琐记》（稿本）为著名书法家龚望先生珍藏，承蒙哲嗣龚绶先生示知和惠借业师武安隆先生。笔者自武先生处得以拜阅并利用此珍贵稿本。在此，谨向龚绶先生和武安隆先生表示诚挚的谢意。

名《东游杂感》)虽于 1922 年由北京文化学社正式出版并于 1928 年再版,但历来的研究对此却很少提及。王桐龄于清末民初曾两次留学日本,时间长达 11 年之久。他的这种特殊经历使他比一般的游历者对日本的体察要深刻得多,这一点在其所作的《日本视察记》中有着充分的体现。因而,在我们研究清末民初中国人的日本观时,王桐龄的《日本视察记》应是不可忽视的资料之一。

在这些新资料、新史实当中,笔者亦有一些新发现。如为借鉴日本的经验,发展直隶的近代教育,直隶省曾于 1903 年派学校司总办、翰林院编修王景禧赴日考察学制。同时,送 23 名直隶青年入宏文学院 进行为期 9 个月的速成师范学习。在这 23 名青年出发赴日前,袁世凯曾接见了他们,并勉励说:“直属经庚子兵乱,诸生皆身历其变。痛定思痛,我国文武皆不如人,宜如何奋励,此次东行数月之期,岂能深求。不过得其大概,归来可以教授学生。惟须潜心向学,不可惑于邪说。如平等、自由之议论,皆与国家为敌。岂有国家培养人才,而令其与之为敌者。诸生宜戒之。北洋武备学生在东甚多,与人往来皆须留意,勿染习气,最为紧要。诸生勉旃!”<sup>②</sup>袁世凯的这番谈话,既提到了身为直隶总督的他何以会那么积极地主张选派官民出洋留学或游历,同时也表明了他对赴日留学生的要求与希望。这一内容,在有关袁世凯及一些相关的研究资料中未见有之。

此外,直隶此次所选送的 23 名青年究系何人?历来的史料均无明确、完整的记载。而笔者发现在刘潜的《东游旅人琐记》中却清楚地写有这 22 人的姓名,作者刘潜本人亦是成员之一。这 23 人当中,有 13 人是由直隶学校司督办胡景桂以学校司(位于保定)

宏文学院,原名弘文学院,1902 年由嘉纳治五郎创办于东京。后为避乾隆皇帝弘历之讳,更名为宏文学院。

<sup>②</sup> 刘潜:《东游旅人琐记》稿本 8 月 22 日条。

的名义选送的，另外 10 人则是由严修从天津保送的。学校司所选送的 13 人是：王振世（古愚）、王倬、高步瀛（阆仙）、张文瀛（云阁）、吴蔼宸（鼎昌）、赵次原（宪曾）、张良弼（体仁）、胡源汇（海门）、马晓珊（鉴滢）、路雨三（沛霖）、周学章（子蔚）、王宋坡（璟）、崔谨（子馀）而天津所保送的 10 人之名字的通常用法分别为：陈哲甫（恩荣）、胡家祺（玉孙）、陈宝泉（筱庄）、郑炳勋（菊如）、俞明谦（悒臣）、华泽沅（芷龄）、徐毓生（霁）、李金藻（琴湘）、刘宝慈（筑生）、刘潜（芸生）<sup>①</sup>

通过刘潜的《东游旅人琐记》，我们不但找到了直隶省 1903 年所派的 23 名学习师范的青年的姓名，而且对他们的在日学习情况亦有了一定的了解。在新式教育的发展初期，亟需掌握近代知识的师资，而培养师资则是新式教育顺利发展的一个重要保证。直隶所选送的这 23 名青年，日后大都在教育领域尽力，其中不乏颇有影响、颇具贡献之人，如陈宝泉、陈哲甫、刘宝慈等。所以，弄清他们的姓名，进而探讨他们回国后所从事的教育活动，对于我们研究东游对直隶省乃至全国的教育发展的影响与作用至为关键。

3. 有助于我们认识自己，找出差距，发奋努力。了解别人，是为了更好地认识自己。当日本作为世界上经济最发达的国家之一，在许多方面都值得中国学习。自 20 世纪 70 年代末起赴日留学、考察的中国人络绎不绝，形成了新的东游热潮。而在近一个世纪前，中国也曾提出“以日本为师”，且也有大量的国人赴日考察、学习。那么，中国与日本之间的差距到底在那里？这种差距是现在形成的？还是过去就有的？笔者认为，探讨近代中国人的日本观，对我们找出差距，清醒地认识自己是很有帮助的。以教育而

参见刘潜：《东游旅人琐记》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天津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天津近代人物录》，天津地方史志编修委员会总编辑 1987 年版。

论 早在 20 世纪初，游日者就已认识到，日本的小学教育普及率已高达 98.7%，而日本教育普及的原因乃在于，国家对普及教育非常重视。并且，为保证儿童都能接受教育，日本采取了许多行之有效的措施，如孩童不学，家长受罚等。反观我国现在的教育状况，失学儿童不在少数，一些家长为了赚钱，甚至不惜让孩子辍学经商。在这方面，即使与日本的过去相比，我们的差距也是很明显的。当然，只有找到差距，才能有针对性地努力。而近百年前东游者的日本观，恰恰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认识的参照系。

4. 为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提供借鉴与经验。今天的中国已经认识到，要想发展经济，提高综合国力，就必须走改革开放的道路。只有改革开放才能更好地与外国进行交流，学习其先进的文化与经验。在如何向外国学习以促进中国经济发展等方面，清末民初的游日者为我们提供了许多可资借鉴的经验。如游日者曾指出：

“忆自互市以来，进口种种货物何一非机器所制造，较我国之尽赖人力，其便捷可省二十倍之多。既欲振兴商务，步武泰西，设局场、购机器、聘技师、募技手，所有车船、枪炮、金石、土木以及螺丝、纺纱、织布、缝衣、印书、造币等物，无一不资力于机器。以机器之货品考之，近年入款颇见增加。然虽分机器制造之利，而不知制造机器之利，亦与不知机器制造者等益。机器不能自制，必须购自外国；不能运用，必须依赖于外人；损坏不能修补，亦必仰藉于外人，一若无外人即如无此机器者。外人遂欺我不知，傲我不能，于机器之价值任意居奇，技师、技手之薪工多方需索，甚至彼出新式之机器，即以旧式不合时用者售与我，或以曾用者售与我，而我竟无察觉，方且忻然自喜，以为工艺可即此日精，商务可由此日盛，不知不能制造机器，节节必仰给于外人。其购办机器之经费，修治习用，各人员之薪工，殆非细数所能敷用，纵使藉机器获有余利，恐未杜此绝大之漏卮也。夫工艺乃商务之本，机器则又工艺之本，孔子

所谓‘工欲善其事 必先利其器’者是也。我国欲振兴商务 必先从工艺入手，尤必从机器着手。倘犹不求自造机器之法，第汲汲以望商务之振兴也，窃恐有若缘木求鱼者。’<sup>①</sup>应该说 这样的看法 即使在今天也是适用的。

改革开放，需要魄力，更需要吸收先进的经验。只要这样，才能做到不走或少走弯路 才能促进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项事业的迅速发展。因而，从这个意义上看，清末民初的游日官民通过对日本的考察所得出的种种认识与思考，为我们搞好改革开放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和借鉴。

# 第一章 清末东游热的兴起

清末东游热的出现，与近代中国形成的向西方学习的思潮密不可分。在这股思潮中，日本由过去的学生转而被中国视为师长。文化输出与接受关系的这种逆转，从一个侧面揭示了近代中日关系的变化。

## 第一节 以日本为师

1. 甲午战争前的中国与日本在 1840 年（道光二十年）的鸦片战争中，英国以炮舰轰开了中国长期闭关锁国的大门，给中国带来了空前的民族危机。面对西方的船坚炮利，林则徐、魏源等人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主张应学习西方的武器和练兵技术以保疆土。自 19 世纪 60 年代起，为镇压国内风起云涌的人民起义，维持清王朝的统治，奕訢、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清朝当权派官僚以“自强”和“求富”为标榜，依靠英、美、法国的援助，采用一些资本主义的生产技术，着手开展洋务运动。洋务派大量购买外国的枪支、炮舰等武器，采用新法操练军队，并陆续兴办了一些军事工业，如江南制造局、福州船政局和各省机器局等。从 70 年代起，他们又采取官督商办的形式，开办了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天津电报局、唐山胥各庄铁路、上海机器织布局、兰州机器织呢局等企业。近代化的产业形式开始在中国出现。然而，在 1884 年（光绪十年）的

中法战争中，洋务派的劳作并未起到多大作用，中国不战而败，再次暴露了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和惧外的软弱心理。1885年（光绪十一年）以后，洋务派控制了海军衙门，购买军舰，成立了北洋海军，并以官商合办的方式开办了一批工矿企业。洋务派所办的这些工矿企业，为中国带来了一些近代的生产方式与先进的仪器、设备。同时，由于其在技术和原材料上多依赖外国，因而也加深了英、美等西方列强对中国政治、经济、军事的控制。在1894至1895年的甲午战争中，中国的失利使洋务派遭到毁灭性的打击，其所提倡的“自强求富”运动亦随之偃旗息鼓。

自19世纪70年代中后期起，中国国内还出现了改良主义的思潮。以马建忠、郑观应等人为首的资产阶级改良派，鉴于开放五口通商与实行关税协定之后，外国经济势力渗入中国，不断地侵及中国的主权和利益，主张应从经济上学习西方，发展民族工商业，与外国进行商战，以争利权。然而，这一切努力亦未能挽救清王朝的颓势。与此同时，中国昔日的学生日本却迅速崛起。

老大帝国清朝在鸦片战争中的失败，给东邻日本以很大的刺激。长期以来，日本同中国一样，国门紧闭。1853年（嘉永六年），美国东印度舰队司令培理率舰叩关，使锁国体制下的日本面临着严重的政治危机和民族危机。面对来自西方的侵扰，日本开始积极地寻求出路，以保民族独立。为此，幕府首先对以学习西方近代军事及近代科学为主要内容的洋学予以大力扶植。1855年（安政二年）和1857年（安政四年）在幕府的请求下，荷兰先后派海军军官佩尔斯雷根（Pels Riic Ken）与军医鲍姆培（Pom Pe）赴日，帮助日本人开设了海军讲习所与医学讲习班。作为学习洋学的独立机构，1855年，幕府还设立了洋学所。1857年，洋学所改称为“蕃书调所”，以此为中心，洋学的学习与研究得到了广泛的开展。洋学的兴盛，使日本很快地涌现出了一些通晓近代技术的人才。幕府还从国外聘请了大批技术专家，并依靠他们创办了不少近代工业，

如浦贺造船所、石川岛造船所和关口制造所等。与此同时，以萨摩藩为首的各强藩也积极进行藩政改革。藩政改革的重点之一就是整顿洋学设施，开展洋学教育，创办近代工业。1866年（庆应二年）后，幕府不但准许国民出国学习或进行贸易，而且还与各藩一起，开始向英、美、法等国家派遣留学生。在幕末日本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佐久间象山、福泽谕吉等思想家的作用不容忽视。他们不但积极主张开国，而且还大力介绍西方的社会文明与政治制度。

1868年（明治元年），在国内矛盾的激化和国外列强的压力下，将军德川庆喜被迫向天皇交还大权，结束了日本历史上长达250多年的幕府统治。

取代幕府而上台的明治新政权在成立伊始，即以“富国强兵”、“殖产兴业”为目标，在幕府所办工业的基础上，大力提倡发展资本主义。殖产兴业是富国强兵的基础，为此，明治政府首先从经办官营事业着手，积极导入、培植近代产业。1870年（明治三年）政府设立了工部省，作为培育官营事业的中枢机关。明治政府初期所办的官营事业以军事工业为主，其所掌握的工业设施有长崎造船所、兵庫造船所及一些机械制造工厂。同时，它也经营矿业，并拥有对矿山的开采权。为使上述事业能够顺利的发展，明治政府从一开始就雇佣了大量的外国技师，并不惜花费重金引进西方的先进技术。此外，还创办了工学校，以造就人才。1871—1872年（明治四至五年），明治政府又派岩仓具视率使节团出访欧美诸国，考察各国的文物制度。对西方各国的考察，令使节团成员对产业的发展与如何发展有了比较具体的新的认识。使节团副使大久保利通归国后不久即担任了内务卿，积极致力于推进殖产兴业政策。设立于1873年（明治六年）的内务省在大久保的主持下，以劝业寮为中心，在全国各地广设官营模范工厂。其模范工厂在生产过程中，同样亦聘请了国外的技师，购买了西方的先进设备。此外，内务省还推行振兴国产化企业、扶植民间企业的政策；开办农事实验